

高等学校哲学研究文库

中国农村改革的 哲学思考

张铁森 刘金生 陈钧生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高等学校哲学研究文库

中国农村改革的 哲学思考

张铁森 刘金生 赵鹤山 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600号 F/1.2

序

农村改革——哲学应用的广阔天地

谢 龙

我国现代史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及当今经济体制根本性变革都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主阵地，并且从农村开始、逐步遍及全国而赢得成功的。占全国人口大多数、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我国农民所绘制的雄伟而壮丽的历史画卷，蕴含着对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新哲学在东方中国的创造性发展。广大农民始终站在革命与创造的前列，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国情。广大农民是我国现代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离开了农民就不会有实践的成功，也不会有哲学理论的创造。因此农村改革的哲学，是涉及当今我国改革的全局性的哲学课题。不能因这个课题侧重于应用而对其意义予以贬低，应用是将哲学理论贯彻于实践，这是哲学理论创造的源泉，离开了应用，哲学理论则无从完善与发展。

回顾历史，我国近现代的历史辩证法主要是通过广大农民的革命与创造活动展现的。由于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掌握与运用历史辩证法，在正确解决农民问题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才使我国革命走上成功的道路。民主革命通过土地改革，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而取得伟大胜利。土改后，不失时机地在农村实现合作化，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的顺利确立。随后的二十年间曾因违背历史辩证法，工作重点未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出现了曲折，僵

化的高度集中的体制极大地束缚了农村生产力和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我国经济处于低谷陷入极度的困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工作重点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开始摆脱困境，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进入新时期，由于农村改革先行，为改革能在全国铺开并健康进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谱写出绚丽多彩的历史辩证法的新篇章。

农村改革中农民的两大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都是真正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作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现实矛盾的产物，它们既纠正了因违背历史辩证法所发生的失误，又避免了同样是违背历史辩证法的“西方老路”。两大创造是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变改旧体制后农村生产关系、经济体制的具体形式，乡镇企业也是改革后发展农村生产力实现农村工业化的具体形式，两者的联系体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废除了人民公社，但未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以这种新体制为龙头，形成并确定了适合于生产力状况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组合的所有制格局。正由于它适合农村生产力状况和广大农民愿望，从1983到1987年短短五年间就有1.8亿农户实行这种新体制，占全国农户的98%。家庭联产承包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而乡镇企业就是由此而“异军突起”的，它加速了我国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吸收上亿农民就业，促进农业经济的繁荣，这也表明它迥异于西方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到1993年，我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已达到29000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并且增长率遥遥领先，成为我国整体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部分，显示了农村改革成功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

农民两大创造所蕴含的历史辩证法表现为形形色色的矛盾，它们正以生动的形式从多层面展现出来，急切地要求人们予以正

确地认识与处理。其中引人瞩目的有以下的矛盾：

第一，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需要正确处理“统”和“分”的矛盾问题，通过统分的最佳结合，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为健康地发展。

第二，大力发展战略企业，使之向更高巅峰攀登，需要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矛盾问题以及城乡矛盾问题，促使农村经济繁荣并积极探索国有大中企业和乡镇企业联合发展的道路。

第三，围绕经济效益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需要正确处理农工贸的矛盾问题以及单一经营的旧习和多种经营的客观需要之间的矛盾问题，向农业经济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第四，积极推行科技兴农战略，需要正确处理低产和高消耗的矛盾问题，力求达到高产、优质、高效。

第五，随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正确处理贫和富的矛盾问题，更有效地扶贫，解决处于贫困线的数千万人的温饱问题，并开拓共同富裕之路。

第六，面对农村人口增长高于城镇人口，需要正确处理超生和农村教育、卫生、保健条件差的矛盾，在优生优育和控制农村人口上下大力气抓好。

第七，面对农村二亿剩余劳动力，需要正确处理内部消化和外部分流的矛盾问题，加强就业管理，缓解农村就业并建立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第八，面对农村工业发展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大力强化环境管理，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第九，发展农村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正确处理普及基础教育和发展技术教育的矛盾问题，为农村培养大批适应性强、专业知识丰富的实用型人才。

第十，活跃农村文化迫在眉睫，需要正确处理低俗和高雅的矛盾问题，寓教育于文化普及之中，形成与巩固健康的农村文化。

阵地。

仅从以上列举的较为突出的十个方面的矛盾来看，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急需哲学予以总结，现实矛盾的解决急需哲学予以指导，农村改革确为哲学应用的广阔天地，应郑重呼吁哲学工作者面向农村，关注、研究与参与农村改革。为此，特向读者推荐由张铁森、刘金生、陈钧生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哲学思考》一书。张铁森是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哲学教师，现兼任该校乡镇企业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多年从事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哲学研究。刘金生是一位近年来脱颖而出的新型干部，现任中共延庆县委书记，他兼具党务工作者和企业家的双重品格，对在农村工作中应用哲学有深入体会。陈钧生是外交学院哲学教师，结合改革开放研究哲学颇有独到见地。《中国农村改革的哲学思考》一书是他们三位“结合”主持编写的成果。其内容值得肯定的不仅在于对所论农村改革问题的具体见解颇多启迪，更在于探索开拓哲学迈向农村改革广阔天地的新路方面引人深思。

借写序之机，对哲学的任务以及农村改革面对的诸多矛盾略述我的不成熟看法，诚恳地同读者切磋，望予指教。

目 录

序 农村改革——哲学应用的广阔天地	1
第一章 农村改革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农村改革的突破	1
二、农民的伟大创造和农村改革的进程	21
三、农村改革与农业、农村发展	43
第二章 农业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56
一、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56
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与评说	69
三、深化改革，进一步振兴农业经济	83
第三章 乡镇企业的突起与腾飞	90
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90
二、发展乡镇企业是建设新农村的必由之路	104
三、乡镇企业要实现新的腾飞	117
第四章 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131
一、培育和完善市场主体	131
二、建立和健全市场体系	146
三、加强宏观调控，发展农村市场体系	158
第五章 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与前景	172
一、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是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保证	173
二、农村的民主建设与调动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	192
三、农村的法制建设与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205
第六章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217
一、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是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217
二、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和问题	226
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	242

第七章 新时期工农联盟的重构与发展	253
一、我国工农联盟的历史性转折	253
二、新时期工农联盟的实质仍是利益联盟	267
三、大力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工农联盟	280
第八章 延庆在改革实践中奋起	296
一、加快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目标	296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奋力开拓	298
三、以发展工业为重点、兴办三资企业为突破口，加速现代化 建设的步伐	303
四、立足延庆实际，着眼首都全局，全面加快经济发展	306
英文目录	309
后记	312

第一章 农村改革与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后期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农村重大改革实践的科学总结是这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十几年来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给建国以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合理的科学结论，也证明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确是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农村改革的实践再次表明：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第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根本利益、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实践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这三者的统一，并以此指导伟大的改革实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农村改革的突破

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重新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带来的结果。这条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

并充满了得失成败的曲折过程。总结这个过程的历史经验尤其是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三次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是有重要意义的。争论的实质在于是否要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规律，这三次争论也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准备了干部、群众和思想等条件。

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农村改革的起步

80年代初，随着农村改革的起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出现，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了神州大地。它唱出了人们对中国农村的希望，也使人们看到了整个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希望。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为我国农村带来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迅速提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等等。更重要的是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开始有力地冲击和摧毁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逐步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而这一切重大变化都是由于中国出现了历史的转折，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才得以发生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前提和哲学基础。1979年开始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争论，也是在这场大讨论的背景下展开的。

实践标准的大讨论是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契机而引发的。在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之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延续“左”的错误，并通过当时的两“报”一“刊”社论正式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显然是为了压制广大群众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强烈要求，因此，遭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群众的坚决抵制。“光明日

报”文章的发表，就是这一抵制的集中表现，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讨论，在理论界和群众中明确了是非，重新恢复了实践标准的权威，实事求是的权威，开始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场讨论中，邓小平同志起了先导和支持的重要作用。他在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还在各种场合多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充分肯定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在1978年12月党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①

确实，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拨乱反正、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过去的“左”倾错误提供了思想前提，它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冲破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精神禁锢，突破与社会实践相悖的旧观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页。

念、旧理论，创立符合实际的新观念、新理论开了先河。

就农村来说，中国农民坚持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胜利是得助于真理标准问题之讨论的。反过来，农村生产责任制实践的结果，又以铁一般的事实在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实践性，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和发展。

在真理标准讨论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在包产到户连年增产的事实面前，中国农村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新的统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恢复，是对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恢复。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我国的革命实践，反对了各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从根本上确立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解剖刀，用它去剖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状况，而不是从马克思的书本上去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现成答案。1930年他专门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①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②他在后来的哲学著作和整风文献中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1941年至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第111、116页。

“看成是死的教条，”“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①毛泽东同志用这样的思想路线武装了全党，使我们党摆脱了几乎陷中国革命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从实践中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特殊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最终使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并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反复多次论述实事求是的基本观点。1956年他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法，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②1963年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又指出：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③同年他在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时，还加写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④

但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能坚持到底，一段时间里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被抛开了，“两个凡是”的提出就是突出的表现。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才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导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实践过程中又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思想路线的内容。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表现在党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版，第8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90页。

思想路线上就是既恢复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把这条路线提到新的高度和增添了新的内容。

邓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规定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贯穿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点。早在1978年他就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①又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②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又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③对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实质，恩格斯精辟地指出：“只有当工人阶级……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它才能亲自彻底认清自己的生活状况。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他证明：人们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由此便产生了适合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④“如实地观察事物”，是实事求是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科学本质和基础。

实事求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贯穿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⑤实事求是明确地肯定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人的思想应该去反映、掌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这就鲜明地坚持了唯物论；实事求是又坚持了认识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说的和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

①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12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

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或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①；实事求是还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在永恒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我们强调实事求是，要从实际出发，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要开动脑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是要求人们的思想要跟上客观实际的变化和发展，而思想僵化则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邓小平同志讲：“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②实事求是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它不仅贯穿在自然观中，同时也贯穿在社会历史观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③实事求是就是要重视具体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从历史新条件的变化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社会实践，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强调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解放生产力联系起来，他极其肯定党的“十三大”的精神“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④由上可见，实事求是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违反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也就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⑤

还需指出，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把解放思想看作实事求是的应有之义，并精辟地论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8—109页。

②③⑤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3、114、12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2页。

求是的内在统一。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① 这是因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② 他还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③ 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应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对此，邓小平指出：“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④ 人类活动都是有一定的思想作指导的，一般说来，人们的思想常常是落后于实际的变化的，要使思想能符合变化发展着的实际情况，就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抛弃陈旧的认识。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正是伴随着不断地解放思想而不断深入发展的。当然，解放思想绝不是胡思乱想，它是有严格的科学界定的。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因此，解放思想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即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以它们是完全同一的，正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⑤

最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①②③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1、131、133页。

④⑤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3页。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所以，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①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的、可贵的探索，但由于逐步抛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连连出现失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情况，违背了党的“八大”所确定的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则基本上背离了这条思想路线，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恢复和发展了这条思想路线，从哲学上重新武装了全党，在实践中开辟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带有自己特色的的新路，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有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个科学的理论观点。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概括为九个方面，形成比较系统的科学体系。由此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一个艰巨、曲折和长期的过程，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也是这样的结合过程，总结这个过程有利于加深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解，也有助于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深切认识和把握。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页。